

●毕胜德 岳智宏 主编

十大贪官现形记



警世档案丛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1995年9月27日)

江泽民

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醒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进城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绝大多数同志经受住了考验，但是也出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改革开放开始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向全党打招呼，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同志这些话讲得很及时、很深刻。我们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干部，包括有的高级干部，把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告诫当耳旁风，不注意学习和改造自己，结果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前车之鉴，希望大家务必引以为戒。在反腐败问题上，今后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手抓，把反腐败斗争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结合起来。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反腐败斗争负总责，首先把领导班子管好，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对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都要一查到底。要立一条规矩：哪里有严重问题不查处，就追究那里领导的责任。

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严以律己，防微杜渐。党员

FJ4668

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如果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就会身败名裂。因此，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思想境界更高一些，坚持党的事业第一，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为国家、为民族奋不顾身地工作。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对个人的名利待遇等等，就能够正确处理。只有这样，人生才有意义，生活才充实。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什么人？建议大家重读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同志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和战争年代大不一样了，毛主席这些话是不是过时了？没有过时，应该说更有现实性。各级领导同志更应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群众能做，我们领导干部不能做。比如夜总会、高级舞厅等高消费娱乐场所，我看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是不要去，要有这个自觉性。

各级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现在有的干部职务升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却放松了；权力一大，直接监督他的人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多了。如果自己不警惕，组织上又不及时教育和监督，就很容易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因此，为了爱护干部，党组织要抓好对干部的经常教育、管理和监督。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同时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各级党委不仅要管好干部的选拔任用，而且要管好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发现干部有了缺点、毛病，要及时指出，进行

帮助,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每个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党内各项规矩,参加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无论职位高低,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我们党内,决不允许存在超越于党组织和党的纪律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人物。

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个问题。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要讲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提醒过我们。1983年,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就指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要把加强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郑重地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强调“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又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986年,他在天津视察时又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邓小平同志是无产阶级大政治家,他最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这一点对高级干部尤其重要。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重视起来。我们的高级

干部，绝大多数政治上是好的，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有的干部，也确实存在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的问题。我们讲加强政治纪律，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党章，按党章的规定去做。对党章的各项规定，所有党员都要遵守，高级干部更应该带头遵守。比如，党员义务第一条规定，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你如果不学习，怎么当好领导，怎么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怎么把握政治方向，怎么提高政治辨别力？

（199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本文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标题是该报编者所加）

本丛书工作人员



策	划	马	玮		
主	编	毕胜德	王新民		
		晓冰	徐斌		
		王莉娟	马兰		
		岳智宏			
编	委	王诗洁	王平		
		白梅	一芳		
		壮志	杨敏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摘录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

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的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序：对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毕胜德

清除腐败现象，是任何社会政治生活健康和稳定发展的关键一环。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亦必须有效抑制和清除正在蔓延的腐败现象。

一、腐败现象的哲学思考

人性是为公的还是为私的？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带着先入为主的伦理学色彩，对人性横加评判。实际上人性是自在的、客观的，很难用好与坏、公与私、善与恶的概念把它说清楚。它的性质是中性的。是社会性与为我性的辩证统一。

人的本质是社会性，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具体的。这只说出了人性的一个方面，并且是特殊方面，即社会性，说清楚了人区别于其它生物（或更准确地说是动物）的特殊规定性，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真理走到这一步，并不是错误的，问题在于有些人把社会性看做人性的全部内蕴。

因为把社会性当做人性全部的人，是把人从动物界、生物界、自然界当中割裂开进行个案研究的结果。他忘记了人是动物界、生物界、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具有自然存在的一切生命的共性，即保持自身存在的为我性。

为我性应该这样理解：

人和其它生物都是存在,这是客观的、公理的;

人和其它生物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持“存在”,这也是客观的、公理的。

人的本性是为我性的,它的另一面是社会性,这两者统一于人类的“存在”。为我性是第一性的、起决定作用,在这对矛盾中处于主动的进攻地位;而社会性是第二性的、被动的,它反作用于为我性。社会性从本质上说是为人类为我性服务的,是人类为我性在人类社会这个特殊范围内实现的手段与方式。

为我性与社会性这对矛盾,时常寻求着谐调。社会性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物化为道德、法律等;而为我性在时时改变着破坏着社会性中不适应变化的因素,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尤为明显。

在谈论为我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时,还涉及一个“范围”问题。在人类社会所设置的各种不同“范围”内,为我性和社会性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和变化,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些不同的“范围”包括:个人、家庭、团体、部门、行业、单位、党派、地区、阶层、国家、人类等等。在一种范围内称做社会性的东西,在扩大的范围内会变为为我性;在另一种范围内称做为我的东西,在缩小的范围内又可转化为社会性。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超越个体的范围要求权力的出现,以便更好地满足范围内为我性的要求。这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

权力给人类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在为我性的底色下,也会带来权力者运用公共管理力量谋取个人私利的问题,这就是腐败。

人类的为我性是不可能消灭的,权力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也是不可能消灭的。腐败也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消失。

腐败的不可消失,并不是我们承认了它的合理性、我们的被动和我们的束手无策,而是我们应更加警惕腐败的产生和蔓延,深层

次地认识腐败的顽固性。这是我们在现实中防范腐败！使腐败尽可能减少的内在驱动力。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怀着神圣的责任和义务参加进反腐败的斗争中去。

二、遏制腐败的建设性意见

（一）权力需要监督

卢梭说：没有制约的权力会产生腐败。孟德斯鸠也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王沪宁在《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中说：“过去一直强调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或一两次政治斗争来清除腐败现象，而没有过多重视从体制上防范腐败现象，等腐败现象出现之后再去清除，其危害性已经变为现实，关键的问题是防患于未然，不使腐败现象轻易得以发生，或不使腐败现象轻易得以大面积发生，这就需要建立起完整的制度和规章，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无隙可钻。”^②

1. 体制监督，就是指要建立一套对国家政治权力给予制约的监督权制。只有建立完整、周密的监督机制才能避免权力滥用。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

体制监督的有效实现必须坚持两个原则：

①独立性原则。

国家监督的实质就是对权力运用的制约，就是对权力负作用的遏制。正因为如此，监督对于权力的行使者来说，一般是不自在的，即权力行使者一般很难发自内心地要求他人实现对自身行为的监督。毫无疑问，在这种客观事实下，任何国家监督机制的依附性，任何监督权力的非独立性，只能使国家监督走入片面发展的轨道。因此，国家监督正常运行、及时地实现，就需要监督主体监督权力的独立性。

②双向监督原则。

逐步建立起既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督，又包括自下而上的监督，并以自下而上的监督为主的双向监督模式。权力从高层次到低层次既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坚持上层机关对下级的监督指导基础上，加强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各党派、团体、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的逆向性质，决定了它实施起来的困难程度。然而，它是监督体系中非常必要的环节。在我国推进民主化过程中，显得尤为必要。

列宁说：“正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现在应极力发展这些形式。”^①

2. 社会监督。

就国家监督而言，只有来自国家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才具有国家的强制力，并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也只有这种监督才构成国家监督的组成部分，至于由国家机关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所实施的监督，则因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所以只能称之为社会监督。只有当这种监督被有关国家机关采纳，并以

国家名义进行干预时，才具有国家强制力，并发生法律效力，从而构成国家监督的一部分。但是应当肯定，所有这些来自各方面的监督都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网络体系，并产生着监督机制的整体效应。

3. 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在西方被视为最经济、最有效的社会监督手段，被人称做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覆盖面广，时效快，影响力大。它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舆论媒介通过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政府机关的活动和对选举活动的报道来实施没有国家强制力但却令人望而生畏的监督。

舆论对政府行为的及时调整，对有关政策的修正，对有关决策的可行性分析都提供了可能。舆论监督弥补了国家监督的不足，使在法定秩序内无法实现的监督效应，在公众监督中得到了实现。

列宁对舆论监督给予高度重视：“党和苏维埃报刊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揭露各种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罪行，指出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

（二）对滥用权力者实行严厉惩罚

对于确实查清的犯有腐败行为的人，是监督层次的漏网者，必须给予严厉的惩罚，使任何权力者不敢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现阶段中国的状况，必须采用猛药下沉疴的方法，切忌下不为例、含糊糊糊、以党纪代国法、以罚代刑、惩下不惩上、惩小不惩大等现象。执法要严，任何腐败行为都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对于惩罚要有严格的规定，凡是有腐败行为的官员，一经发现，不得再担任政府职务，应当除名，并且应当向社会公布他们的名单以及他们的腐败行为，让公众了解这些人，以造成一种社会舆论和社会公德的压力。

为了防止一次捞足的心理，罚就要罚得够。不但要把权力腐败

者贪污受贿的价值罚出来,而且可以把这类人罚至一个地方的最低贫困线程度。

唯有如此,才可以使权力者时时惊心,反省自己,使权力者在利害的权衡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对权力者进行思想教育,强化道德约束

有了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督和法纪威慑,缺了操守教育也不行。因为世界上没有无漏洞的规章制度,在法纪暂时不周全的那些细节上,仍然靠掌权者的道德意识自我约束。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么多的公职人员,单靠制度并不能全面解决问题,必须辅之以思想教育。最牢固的防范腐败的堡垒应该是内在化的职责、义务、理想和原则。

要实现强化权力者的道德约束,就必须对权力者进行经常的、不间断的思想教育、道德训练,使外在的道德教化变成权力者内在的自我意识和约束。

这些道德规范应包括:公民道德规约、公务道德规范、个人道德规范、共产党员的道德规范、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思想教育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禁止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用各种借口或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物等。这些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反腐败的现实考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腐败会葬送党,葬送人民政权,葬送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同志说:“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

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④他又说：“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⑤

不反腐败，会危及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但情绪化的反腐败，如果危及了社会稳定，使经济建设无法进行下去，也是有违反腐败的初衷和根本目的的。

（一）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紧迫性

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现代国际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我国在经济、科技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在竞争中我们处于相对劣势。

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强有力地带动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步伐，使世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从整体上再次发生飞跃和变革。以美国为首率先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全面启动，并将逐步变为现实。这将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变化。如果中国自蹈混乱，丧失历史所提供的这次发展机遇，也就失去了下个世纪立足世界的能力，下个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赶超”问题，而是如何保持国家独立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一再提醒我们：

“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⑥

“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

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⑦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⑧

（二）反腐败必须保持社会稳定，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反腐败必须要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什么时候该抓什么、怎么抓、抓的程度等，都要全盘考虑，以实现社会稳定、服务一个中心为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

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大国，现阶段衡量反腐败成败与否的标准，就是看能否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直在提醒着我们：

“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这也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以后更要这样做。要用这个道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⑨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⑩

“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⑪

当前,要实现反腐败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可以这样说,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我们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现实实践中的具体化,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关键,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铁的前提。

邓小平同志说过:

“我的中心意思,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①②}

“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③

“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在历史上,我们有毛主席这个核心。这几年我们出现了两个领导人更迭以及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个核心,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④⑤}

“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⑥

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是带有一般的普遍性意义的,对反腐败事业也就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注: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54 页

② 王沪宁《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三环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版第 50 页

③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72 页

④⑤⑥⑦⑧《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三卷)第 313、327、354、355、375 页

⑨⑩⑪同上第 212、284、286 页

⑫⑬⑭⑮同上第 277、287、319、301 页